

# 中日关系四十年回顾与思考

■王新生

## 40年回顾

友好合作时期(1972年—1982年)。中日友好合作10年之所以出现,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1.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由过去的孤立、对抗、敌视到尼克松访华、中美靠近,是一次政策上的大转弯;2.日本追求新的市场与能源地,中国可以说是十分符合这个条件的国家;3.中国



王新生

急于打破孤立的状态。基于这三点原因,中日邦交正常化迅速开始。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9月25日实现访华,9月30日即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双方结束不正常状态,中国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断交。1978年,邓小平访日与福田首相缔结《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邓小平首相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一时期中日关系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与资源也吸引着日本的投资与技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中日交往最初的10年——友好合作时期。

摩擦与合作的10年(1982年—1992年)。这段时期的第一个摩擦事件是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日本当局将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对华侵略扩张的内容美化为在大陆“进入进出”;但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很好的互动:比如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日,邀请3000名中国青年访华,包括现在的首相野田佳彦也在其中;日本随后也分10年邀请3000名中国青年访日,可以说是当时中日友好往来的一个缩影。接着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带来了4700亿美元的第二批日元贷款,是第一批对华援助贷款

的近9倍。1986年出现了第二次的教科书事件,1987年又出现了光华寮事件。

1988年竹下登首相访华,带来第三批8100亿日元援助。邓小平专程从北戴河赶回北京,感谢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1992年日本天皇夫妇首次访华,明仁天皇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天皇,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经历过战争疏散的痛苦,因此对战争反省得相对较好。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也访问了日本。这是中日的第二个10年——摩擦与合作的10年。之所以出现摩擦是因为经济合作方面出现问题,但通常表现在历史问题上。

对立与合作时期(1992年—2002年)。1992年中日双方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速时期;而日本则在1992年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低迷,紧接着就是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即将还有失去的30年。这期间中日双边贸易由1992年的289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857亿美元,中国对日的贸易顺差已经到当时的50亿扩大到249亿美元。特别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吸引了日本大规模的对华投资;但是在农产品和纺织品的方面,两国出现了贸易摩擦。对立的原因除经济上的压力外,传统安全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对抗与合作的时期(2002年—2011年)。这一段时期比前面的30年更加严峻,双方已经到了紧张化的状态。我们称小泉纯一郎为右翼、保守派,他在日本政界有些特殊——没有属于自己的势力。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日本首相任期一般最多两年,但小泉却做了这段时期最长时期的首相,他的主要手段一是改革,二是打历史牌。这一影响持续至今,现在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也很有市场。他一方面搞改革,另一方面打历史牌煽动民族情绪,中日关系则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局面。

经济方面,日本2001年到2004年对华出口增长率为25.3%,但日本出口增长总率只有4.5%;日本对外投资增长率为-7.2%,但对于中国的投资则是46%。对华的投资比重从1990年的0.6%增加到2004年的12.8%。日本资本之前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害怕中国的政策会变,很多大企业此前一分钱没有投,这一时期则全面进入中国市场。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日企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极大地带动了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造船业、海运业,因为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不够,很多零部件需要从日本国内运到中国来组装。

但这—期间中国人民也出现了一些抵触情绪,比如丰田进入中国的第一则广告就惹怒了中国的网民。有人认为丰田的广告让“狮子敬礼,这是第二次卢沟桥事变”、“日本对中国的新一轮战争”,丰田公司做了好多工作才使事件平息下去;立邦漆的广告也出现了这种引起中国网民民族情绪的情况。

其间,中日关系也出现过几次反复:2006年安倍晋三访华——“破冰之旅”;2007年温家宝访日——“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康夫访华——“迎春之旅”;2008年4月胡锦涛访日——“暖春之旅”,特别是2009年民主党政权上台后,中日关系得到极大改善(鸠山由纪夫上台后,中日关系得到极大改善(鸠山由纪夫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方案,而且该方案最初排除美国)。这是中日关系40年历史的回顾。

## 合作与竞争

合作是主题,但也存在摩擦。比如中日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到2011年飞速增长,人员往来由1万人次增长到570万人次,中国常住日本人口近100万,日本常住中国20万,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为2万,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为12万。日本对华投资700多亿美元;在华的企业有2万多家,间接雇佣了1000万人。

近年来中日双方的角色在互换:中国对日投资超过100亿,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的速度加快,日本媒体惊呼“中国在购买日本”。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老龄化的日本最需要中国市场,日本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去年仅自然死亡就减少了12万人。日本教授曾开玩笑:“中国人不用害怕侵略,照这个速度500年后日本列岛上就只剩下1个日本人了。”日本对华出口占到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0%,中国对日出口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日本成为中国排在欧盟、美国、东盟之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日本的技术提高产业结构,特别是在节能、环保领域。未来在构建一种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中,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很有必要。

但中日之间缺乏一种互信的机制,两国之间的感情很冷淡。2011年8月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国民都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这已经成为常识;但中国公众对日好感度为28.6%,下降10%;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为20.8%,下降6.5%;其中58.4%的中国公众、63.29%的日本公众认为原因在于领土问题。原因是其中中日缺少互信(25.6%、31.6%)。

根据2012年4月舆论调查: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口占30%、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口占20%。

## 缺乏互信机制的原因

第一是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相互适应。以往常常是日本作为一个强者,中国处于弱势位置。现在由于中国发展快,日本压力很大。比如1992年中国的GDP为日本当年的12.7%,2010年则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从1997年到2007年10年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多,去年(2011年)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日本国家预算的两倍,而且其国家预算的过半是依靠发行国债;这样的发展速度确实给日本带来压力。

第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艰难改革。改革均由易到难。经济是考虑怎样做最有效率,而政治是考虑怎样分配最合适。中国目前的情况,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而日本社会则失去发展的动力,如果不改革就会走下坡路。在这一点上,两国都需要坚决改革才会有希望。但艰难的改革需要民意的支持,因而执政者有时会借助民族主义情绪。

第三是领土与领海纠纷。日本是个岛国,领土观念与中国人有本质的差别。由于人多地少,日本人具有很强烈的土地意识,甚至当年日本投降时有人想到“满洲”去投降,想在那边获得土地。所以日本对于领土、领海问题的坚决程度令我们咋舌。

第四是军事安全问题。随着经济逐步发展,我们的军费开支也逐渐增多,目前排世界第二(外国估计为1400亿美元),美国第一(7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近600亿美元)。之前我们会为日本庞大的军费支出感到忧虑,现在换成日本人担心也是正常的。

第五是地区主导权及国际影响力的竞争。在南海问题、湄公河护航问题上日本频频施展话语,表明了在与中国争夺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主导权。

第六是历史问题的阴影。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等历史问题在中国人心中留下永远的伤痕,因此这也成为影响中日互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将来历史问题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淡。

第七是美国因素的影响。按基辛格的话来说:不好不坏的中日关系对美国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国会尽可能地阻止中日关系过好或过坏,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大化。(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可持续发展理念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化

■刘金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城市在现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加凸显,既是环境问题的高发地和社会矛盾的集结地,又是引领和带动全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和支点。可以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决定着—个地区乃至—个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综合实力的提高。

## 可持续发展:我国城市的重大现实课题

城市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策源地,是对自然地理空间规模化、集约化开发利用的生存聚落系统。相对于城市而言,村落似乎是人类的“原籍”;相对于村落来说,城市是人口集聚的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新家”。在漫长迟缓的前工业化阶段,古代城市的总体发展空间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畴,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村落“老家”。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的新的历史时代,现代新兴城市迅速崛起,古代城市加快向现代城市转型,城市“新家”迅速增多增大,城市化率大幅急剧攀升。世界城市化率在19世纪初仅为3.9%,20世纪初提高到13.7%,21世纪则呈现出狂飙突进的势头,2005年城市化率达到48.9%,2007年突破了50%,2010年则攀升至67%。目前,世界上已有近4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引发大量人口源源不断地从村落“老家”迁移至城市“新家”这一历史进程的机理和经济逻辑,是综合性的、动态性的,只有深刻理解城市是“人类家园”这一本质内涵,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对此,美国著名城市史学者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书中进行了抽象和概括,指出集聚效应和系统效应是现代城市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我们知道,城市作为—种社会聚落形态,并不是人类、各种建筑物和设施的机械混合物,而是一个复杂系统和有机整体,其功能并不是由城市内部各要素的功能简单相加,而是由各要素的功能相互协调、有机整合以后产生的。现代城市建立在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专业化基础之上,高度分工和高度协作带来高效益,使城市成为有机体和生产力的源泉。城市又是—个社会的有机体,较之于村落和古代城市,现代城市的社会组织发达,社会结构复杂,人际关系多元,生活方式多样,城市的各种制度规范、习俗相互配合,以保持

城市生活的有序协调进行,城市还是文化的容器,不同时代的城市都吸引、集中了各类社会精英,是人类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中心。同时,城市的发展又密切依赖于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从环境看,城市选择并依存于较为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地理区位,以大量、密集的人工设施高强度地改变了自然环境,可以说,如果城市“人工环境”的工程化程度愈高,以现代科技手段对环境容量的人为提升度愈大,那么城市生态环境就愈脆弱,环境问题也就愈严重。从资源看,城市是各类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集聚节点、流通枢纽、转换中心和最终消费地,城市运营所需要的大量资源来自城市外部,尤其是周边腹地。城市自身的资源状况、城市吸引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城市利用和转换资源的效率,是构成现代城市经济素质和比较优势的基本条件。只有当城市规模与环境容量和资源保障相协调时,城市系统才能发挥最佳的集聚效应和放大效应。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率由30%到60%之间的城市化快速推进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城市化水平由2000年的36.3%提高到2010年的56%,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是1949年至2000年间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的2.4倍。这也意味着全国每年新增城市人口1500多万人,如此快节奏、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不曾出现的。城市化理论表明,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和城市设施高强度建设的城市化加速期,是城市面临可持续发展压力和问题比较集中的敏感时期,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基础和能力建设最为关键的特殊时期。我国城市特别是近几年来迅速崛起的区域中心城市,正处于可持续发展的敏感时期和关键阶段。

##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在统筹考虑当下发展和今后发展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状况和面临的共性问题来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为:首先,构建生态型城市。工业化是城市发展创造经济基础和技术手段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城市生活疏离自然界、灰色覆盖绿色、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一位苏联生态学家提出“生态城市”概念后,较短时间内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确认和推广。“生态城市”主要是从系统科学的视角采用生态学基本观点对城市进行设计,建立有序、高效、和谐、健康的市民聚居环境。生态城市中的“生态”,已不仅仅是指传统的自然生态,而是一个内蕴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诸多内容的综



刘金祥

合概念。许多学者认为,21世纪是生态世纪,即人类社会从工业化社会不断走向生态化社会,城市生态环境日益构成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态环境越好,就越能吸引人才、资金和物资,进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建设生态城市也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的焦点,国内很多城市把建设生态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作为主要目标和发展模式。特别是2004年国务院公布了“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标准及评审方法,标志着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现代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把建设生态城市作为工作切入点,使之成为解决城市发展与环境矛盾矛盾的突破口。

其次,打造经济高端化城市。经济高端化城市是指在区域经济、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分工和竞争中,占据产业结构和价值链高端的城市。—个城市要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带动周边区域可持续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必须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改造和转移替代传统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培育现代新兴服务业,完善城市服务体系,重点强化外向化服务功能。具备条件的大中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要率先形成服务业占主体、外向化服务产业和功能比较完备的高端化、服务化城市经济结构。

第三,建设数字化城市。自1998年美国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后,“数字城市”观念不脛而走,迅速成为—个世界性热点话题。国内众多城市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都提出了建设“数字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保障措施。“数字城市”就是把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到城市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城市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性技术平台和普遍性技术手段。城市的高度信息化和数字化,将会极大地调整、优

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对于城市加强对内对外的信息处理、过程控制、系统集成以及提高效率、降低消耗,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建设数字城市,是推进城市现代化、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四,建设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市的内涵,一般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的城市。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世界公认的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四条基本标准为: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在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在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创新产出高,发明专利多。按照上述以科技创新为主的标准体系衡量,国内大多数城市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建设创新型城市,既要紧紧把握科技创新这个核心环节,又要积极推动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机制体制创新以及对外开放创新、企业管理创新和城市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系统创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把城市导入可持续发展轨道的根本途径。

第五,建设文化特色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根基。—座城市的文化特色往往是历经漫长岁月逐步积淀而成的,它是一座城市的优势和魅力所在。—座没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徒具躯壳,缺少血液,人心难以凝聚,发展缺乏活力。—座城市繁荣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其文化特色弘扬和再造的过程。一般而言,城市文化特色外显于城市的品牌形象,内化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只有站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发掘和整合城市文化资源,认知和传承城市文化传统,重塑和强化城市文化特色,才能实现城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能为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第六,建设低碳化城市。低碳经济是建立在以能源的清洁开发与高效利用基础上的,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以低能耗、低排放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其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作为大量消耗能源、污染环境的城市,采用低碳经济模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笔者所理解的低碳城市,是指全面采取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模式和低碳生活方式的城市。建设低碳城市的核心是对城市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以及居民生存发展观念进行革命性变革,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完善、观念引导等措施,加大“降低碳排放”力度,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作者系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编,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

# 食品安全与经济学原理

■金宽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出于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很多人开始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在郊区或农村租赁土地,自己种植或者雇佣农民种植。这种放弃社会分工,回到传统小农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真的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吗?其实这其中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和操作上的不可行性。

首先,人们相信自己不施农药,就能种出安全的蔬菜水果。事实并非如此。人类使用农药已经很多年,即使一些农药已经被淘汰,但由于其残留期长,现在还有一些依然存在环境中。美国科学家发现,哪怕是“有机苹果”,大部分也能够检测出至少一种农药。因此,我们认为“自己种的食物没有农药”,只是因为没有拿去检测而已,并不是真的就没有。还有很多“有毒成分”是现代工业污染导致的,普遍存在于空气、土壤和水体之中。比如二恶英,欧洲发现自然养殖的鸡蛋中的含量甚至更高。此外,还有一些食品中的霉菌、真菌毒素等,是天然存在的。自给自足者很多缺乏专业知识,不知该如何处理。而它们对人体的危害也不可忽视。

其次,种植蔬菜、水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机种植”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比如说,一旦蔬菜长虫,靠人工捉虫是不可能的,不使用农药就只能任由虫害肆虐,最终没有收成或收成很不好。对于多数的土地来说,必须施肥蔬菜才能有好的长势。一旦施肥,就面临使用何种肥料的问题。人们一般认为“农家肥”比较安全,事实上未经处理的“农家肥”所携带的病菌同样会导致健康隐患。如何选用工厂生产的有机肥和有机农药,则又涉及到专业知识和经验。

另外,自给自足也解决不了食品多样化的问题。自己能够种植的往往只是—些容易种植的蔬菜,而蔬菜只是食谱的一部分。人体所需的营养还来自水果、谷物、禽畜、鱼虾、蛋奶制品、豆类坚果等。这些食物靠个人租地是很难生产的,还是需要从市场上购买,而这些恰恰是更容易“出问题”的食品。

总之,按照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规律,要满足社会对于安全食品的要求,需要专业化的农场供给。因为安全食品的生产是—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不仅仅是不打农药、不施肥,还需要优质的土壤和水。而土壤和水的达标,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业的技术设备。另外,安全食品的生产还涉及复杂的市场调查、销售网络的建立等问题,这都不是自己所能解决的,必须依赖社会分工的各个环节去协同完成。

因此,从根本上说,“自给自足”无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充其量只是—种因回避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在当代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个人或家庭生产食品又纺纱织布,虽然效率低,但不需要付出交易费用。而当社会分工出现以后,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有效地弥补了资源稀缺的问题。但分工与专业化在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会造成交易费用的增加。分工与专业化收益的取得需要以交易费用的增加为代价。而交易费用,也会反过来影响分工和专业化生产。

因此,—个运转良好的商业社会,既需要推进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又需要尽量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人们将放弃分工退回自给自足的状态。当依靠市场自身难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时,就需要国家出面来制订—系列有效制度,通过政府机构的专业技术治理来降低交易费用。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个切实有效的途径就是政府为消费者提供有机食品与安全食品的认证。但是我国有机食品与安全食品的认证目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验证标准均为定性标准,这就增加了认证的度量难度和科学性;第二,政府相关部门未能有效地为消费者提供真实信息。而在市场上,—些获得资格认证的企业,通过对外出售标签谋利,由此造成了资格认证的混乱。

其实,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没有捷径可走,要靠企业的自律、社会的良知和法律的约束三管齐下。国家需要做的是,对食品领域进行有效管制,借助于政府专业机构的技术治理,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信息甄别支持,从而消除分工与专业化的障碍,为市场机制的运作提供制度支持。

(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食品工程系博士生)